



噩梦

大家小絮

张克澄

文革于我，是场噩梦，也是人性解密，善恶解读。

1966年文革初期，父亲既是黑帮又是反动学术权威，不知根据什么，银行户口就被冻结了。母亲不甘心，找出一张600多元的定期存折，嘱我去清华储蓄所取50元试试。填好单子交进去，眼看着第一关审核第二关复核过了，等着放款，不料却有第三个人，一手拿着单子，一手在另一张纸上顺着捋。正在胡思乱想，还有手续？忽见那人站起来问：“谁取张维的钱？”我急忙举手，只听一声断喝：“张维的帐号冻结了！别想蒙混过关！”顿时四周一片静默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真恨不得挖个地缝钻进去。

这只是噩梦开始。

这年的8月下旬，我从城里回来，家里一片狼藉，客厅里散乱着书，一上楼就见父亲被两个红卫兵用棍子按着头弯腰站在走道上，其他红卫兵正在各屋翻箱倒柜，一个熟悉的

声音传来，“再去那边看看！”定睛一看，竟是一个近亲！逢年过节他随父母来我家做客，我俩常在一起玩。见我回家，他匆匆带着人离开了。

不久父母每月只发生活费，入不敷出。想变卖点物品，家中值钱的东西诸如礼品、相机、电视机甚至父母从德国带回来的不锈钢餐具几经抄家已不知去向。母亲一向不戴首饰，家里也没金银美钞，举目四望，只剩下书；可文化大革命，知识越多越反动，想卖也没人要。

这时接到房屋造反派的命令：腾地方。原来一家独住的小楼要搬进另外三家。

家具往哪儿搬？看着满满的家当母亲几乎崩溃，父亲却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高兴，家具能卖钱！就这样，席梦思床架、沙发还有樟木箱子等陆陆续续贱卖，暂缓了家里的经济状况。

坐吃山空，何况这点钱！

一天父亲小声对我说，咱家没钱了，你和我一起找找

吧。他带着我搜遍了楼上楼下，终于在楼下一堆杂物中找到一元钱。我们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父亲举着那一元纸币，沉痛地说：“克澄啊，这可是咱家最后的钱了！今后，要是咱家能有那么一天，又有了钱，可要省着花，千万不能忘了今天哪。”

几十年过去，情况早已今非昔比，此景却刻在我心中，闭上眼就能看见当时的那一幕，屁股仍能感受到几十年前的凉意。

1968年底，响应毛主席号召，我去山西插队，临行前向仍被造反派关着的父亲告别。父亲瞅准一个机会对我说：“你记着，我要是死了，就是被人害死的！我绝不会自杀，一定要等着看到结果。”

人在山西，始终放心不下母亲的心脏病和父亲的命运，趁着春节回北京探亲。家里已经没有我住的地方。三个人挤在楼上那间屋，聊到半夜才睡下。刚躺下不久，楼

下传来敲门声，查户口的。来人拿着户口本，问道：“谁是张维呀？”“我是。”那人上下打量了父亲好一会儿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“哦，你就是张维。”又指了指我：“这是谁呀？”“我儿子。”“在哪儿工作呀？”“山西插队。”“回来干什么？”“他妈妈身体不好，回来看看。”“有介绍信吗？”“有。”看了一眼介绍信，那人冲着我厉声说：“这是社会主义国家，你妈妈有国家照顾，不需要你这类孝子贤孙，赶快回山西抓革命促生产去！马上给我回去！”

一向温文尔雅的父亲待人走远后，爆了粗口：他妈的，这个王八蛋！装不认识我！原来离八丈远就跑过来巴结。此人是文革前清华的校卫队长！

父亲随大批教师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。那里是血吸虫疫区，在田间劳动的人大多染上了不同程度的血吸虫病。父亲是“特嫌”，只配喂猪，不准下水。虽然酷暑难耐长了一身痱子，却幸免于难没得虫病。

干校因小虫病难以继，撤回北京，父亲被派押运行李，搭闷罐车走走停停，一周才到达。时值盛暑，又闷又热，痱子发展，背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脓疮，回到家只能趴在床上哼哼。母亲和我隔一会儿就要用温毛巾给他擦去脓水，折腾得一夜不得安宁。

干校在北京郊区继续办，

父亲的背疮疼痛难忍，我自告奋勇去找小组长请假。此人是父亲的学生，留校当助教，过去常来家请教，和我很亲近。我想他一定会准假的。不料他听了我的申述后，却把眼一瞪，手指着我厉声喝道：你回去告诉张维，明天早上6点准时到停车场集合，一分钟都不准迟到！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过狠，心惊肉跳了好长时间。

正不知噩梦何时是个头，1971年父亲突然被宣布“解放”，任革委会副主任。

这突如其来的解放，让父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事后很长时间才知道，得缘国务院成立科教组，钱学森迟群同为组员。两人此前不识，交谈时钱问迟，你在清华工作，张维怎么样了？迟完全不知张维何人，反问道，你和他很熟吗？钱回答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来往也多，他能有什么事啊？见有钱作保，迟回到清华就着人查张维何许人也，遂被解放。

1972年，尼克松要访华。学校通知和我家合住的另三家紧急腾房，说尼克松会来清华看望张维。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后面面相觑，这是从何说起？根本不容置疑，校务部门送来10斤大白，让把屋子刷白；又开了介绍信，去北郊木材厂买家具，要求把家布置妥当，不能给国家丢脸。

前车之鉴，母亲担心哪天又被紧急腾房，买的家具除了

沙发外全都是折叠型的。真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。

结果，尼克松根本没来。

辗转听说，谢静宜不知从哪儿得的信息，说我父亲和尼克松是同班同学。父母不禁哑然！他们从未留美，同学从何而来？

1975年，邓小平重出主持工作，各方面工作都有起色。迟群谢静宜领导的革委会却天天开会研究如何整人。父亲很反感，不愿与其为伍，便找我大爷张度商量对策。大爷建议惹不起躲得起，你就说自己思想改造得不彻底，要求向工人阶级学习，下到车间去！父亲依计而行，打了报告，下到清华设备厂劳动，直到文革结束。

当然，人性不总是恶的，恶中遇善，难能可贵。

父亲得背疮后去校医院治疗，因是反动权威、“特嫌”，医生护士都躲得远远的，没人给他看病。同“黑”的校医院原院长、一级教授、英国皇家医学学会会员谢祖培正被罚扫地，悄悄给父亲使了个眼色，低声说5点以后再来吧。父亲会意，如期而至，谢祖培引父亲到无人处给他处理了患处。后又按此换了几次药，病痛基本解除。父亲将此事记了一辈子，到晚年和我提起，还感念不已。

文革已由中央文件定论，却不断有人为它招魂。故写此文，为文革中的清华知识分子，作一注脚。